

# 疾病被隐喻，更麻烦

## 史上传染性流行病的审美化和污名化

相关链接

### 学知识防疾病 拒绝“乙肝歧视”

对疾病的怠慢，感染之后的恐慌，以及对部分患者产生歧视，往往与不了解、不清楚某种疾病有很大关系，所以经常学习卫生健康知识，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很有好处。为此，记者梳理此前卫生部印发的《预防控制乙肝宣传教育知识要点》，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发布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等文件，带大家科学地认识乙肝。

乙肝是什么，它是怎样传播的？

《预防控制乙肝宣传教育知识要点》介绍，乙肝是一种危害大的严重传染病，但可以通过接种乙肝疫苗和其他措施预防。乙肝通过血液、母婴和性接触三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乙肝病毒。

预防乙肝的关键是什么？

《预防控制乙肝宣传教育知识要点》表示，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的关键。新生儿出生后要及时并全程接种三针乙肝疫苗。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已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管理，免费接种。推广新生儿以外重点高危人群接种乙肝疫苗。此外，还要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使用安全自毁型注射器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具，杜绝医源性传播。

生活、工作、学习里遇到乙肝病毒携带者，有必要紧张吗？

《预防控制乙肝宣传教育知识要点》称，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工作和生活能力上同健康人没有区别。由于乙肝传播途径的特殊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在生活、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中不对周围人群和环境构成威胁，可以正常学习、就业和生活。

握手、拥抱等，会传播乙肝病毒吗？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指出，HBV（乙型肝炎病毒）不经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因此，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接触，如在同一办公室工作（包括共用计算机等）、握手、拥抱、同住一宿舍、同一餐厅用餐和共用厕所等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不会传染HBV。流行病学和实验研究未发现HBV能经吸血昆虫（蚊和臭虫等）传播。

乙肝病毒可经破损皮肤或黏膜传播吗？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称，HBV可经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传播，如修足、文身、扎耳穿孔、医务人员工作中的意外暴露、共用剃须刀和牙刷等。与HBV感染者发生无防护的性接触，特别是多个性伴侣者、男男同性性行为者，其感染HBV的危险性高。

“转阴”“根治”广告在犄角旮旯滋生，靠谱吗？

《预防控制乙肝宣传教育知识要点》提醒，目前，乙肝病毒感染尚无理想的特异性治疗药物，医学科技领域亦尚未攻克有些媒体广告宣传的“转阴”“根治”等难题。乙肝病毒携带者应定期接受医学观察和随访。乙肝患者要规范治疗、定期检查。乙肝威胁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预防乙肝是全社会的责任。

最后，提醒大家，警惕乙肝传播的三种途径，做好预防，远离疾病。同时，学过乙肝知识后，对于身边的乙肝病毒携带者，社会各界要多一份理解、关心、鼓励，拒绝歧视。

本版稿件据《华西都市报》、新华社客户端

疾病的隐喻

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1975年，42岁的苏珊·桑塔格被诊断为乳腺癌四期。彼时社会对癌症的认识有限，除了对病痛和对死亡的恐惧，还有隐形的社会偏见笼罩下的耻感。化疗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桑塔格开始写作《作为疾病的隐喻》：“疾病是生命的阴暗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中一个属于健康王国，另一个则属于疾病王国。”

1978年，《作为疾病的隐喻》发表，阐述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疾病都承载着文化和道德意义。1989年，桑塔格的乳腺癌已经治愈，癌症的普遍化使其失去了某些隐喻，但更加严重的隐喻发生在艾滋病和其他传染性流行病上。桑塔格继而写下《艾滋病及其隐喻》。

《疾病的隐喻》中文译者程巍认为，这两篇文章最初没有发表在《柳叶刀》这样专业的医学刊物上，是因为文章受众并非只有医学读者。“毫无疑问，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仅是一个医学事件，而且被当作是一个文学事件，一个道德事件，一个政治事件，此外，还是一个经济事件。”

关于疾病的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桑塔格承认，人类没有隐喻就不可能思考，但并不代表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桑塔格意在反对的是已经产生了消极影响的疾病神话修辞，以打破疾病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不可靠印象。消除或抵制隐喻是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也是患者对待疾病最健康的方式。

病态的审美

肺结核曾被视为浪漫病

在《疾病的隐喻》中，桑塔格以大量近现代历史和文学中的实例论证表明，疾病（尤其是瘟疫）常常被诉诸惩罚性和伤感性的幻想，成为文学史上不绝的主题。

肺结核是文学作品中涉及隐喻最多的疾病之一，被描写为一种充满庄严和优美的疾病，患者被认为生性敏感、耽于感情，结核病的死亡是崇高、平静，甚至能够升华生命意义的。

19世纪中叶的欧洲，结核病成为具有贵族色彩的浪漫病。在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的讽刺剧《委曲求全》中，结核病被当作伦敦上层时髦人士的病症。两颊潮红、身体虚弱、极度消瘦是肺结核的症状，随着结核病的浪漫化和审美化，这些外显的表象也同时被作为“贵族外貌新的模式”。

桑塔格总结道：“对势利者、暴发户和往上爬的人来说，结核病是文雅、精致和敏感的

标志。”

1820年，患结核病的雪莱写信给同样患病的济慈，“你还是带着那副肺病病人的病容”，“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结核病的作为一种病态审美感，几乎成为一种时代风貌和荣耀。

个性和情绪也与患病关联起来。1672年，纪登·哈维在他的《英国病》中认为，忧郁和暴躁是诱发结核病的唯一原因。1880年，一本标准的医学教材举出的结核病的诸种病因中，情绪抑郁列在其中。

1881年，罗伯特·柯赫发表论文宣布发现结核杆菌，并指出结核杆菌是结核病的首要病因。而1920年患肺结核的卡夫卡仍在信里写道：“我患的是心理疾病，肺部的疾病不过是我的心理疾病的蔓延而已。”

1944年，链霉素开始用于临床，医学证明肺结核不过是一种细菌感染，与患者的社会地位和性格气质没有任何关系，此前萦绕在肺结核上空的浪漫泡泡才被一一戳破。

道德的绑架

快乐的人不会感染瘟疫

鼠疫、梅毒、霍乱、艾滋病以及其他瘟疫面临着几乎相反的隐喻。因为过去对这些瘟疫知之甚少，面对病因不明且传染性强的疾病，厌恶和恐惧使人们赋予其宗教迷信和道德的意义。

古代将鼠疫当作是上天降罪的工具：《伊利亚特》中的阿波罗为惩罚阿伽门农诱拐克萊斯的女儿而让阿凯亚人染上鼠疫；《俄狄浦斯王》里因底比斯国王所犯罪行，席卷了底比斯王国；1348年的大鼠疫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被这样描述——佛罗伦萨的公民们行为太不检点。

流行病常被当作修辞用以描绘社会混乱。英文的“腺鼠疫”（pestilence）派生出形容词“致命的”（pestilent）和“伤风败俗的”（pestilential），意指“对宗教、道德或公共安宁有害的”和“道德上有有害的或恶劣的”。

麻风病在中世纪被认为是社会腐化和道德败坏的象征。法语描绘被侵蚀的石头表面时的l'épreuse一词意为“像患麻风病似的”。“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

瘟疫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审判。到19世纪后半叶，将灾难性流行病解释为道德松懈、政治衰败、帝国仇恨的做法都很普遍。

历史还和心理、人格相关联。历史学家凯斯·托马斯描述，在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瘟疫肆虐的英格兰，人们普遍相信“快乐的人不会感染瘟疫”。

“像任何一种极端的处境

一样，令人恐惧的疾病也把人

的好品性和坏品性统统都暴露出来了。然而，对流行病的常见的描述，侧重于疾病对人格的毁灭性影响。”

附加的伤害

应使疾病回到疾病本身

“所有那些病因已被查明、并且能被控制和治愈的疾病，最终都被证明只有一个生理原因——如双球菌之于肺炎，结核杆菌之于结核病，维他命缺乏之于糙皮病。”结核病、天花、霍乱等都因为医学进步脱离了绝大部分隐喻，但对于那些此起彼伏的传染疾病而言，隐喻仍然承担着新的文化排斥和社会区隔功能。

在当代产生广泛影响的SARS、禽流感、埃博拉等传染病，因为没有随即出现的疫苗和效果显著的特效药再次让人恐慌。“SARS病毒像一个来去无踪的幽灵，这强化了它的神秘性，而神秘性正是隐喻的滋生地。同时，这个科学至上的时代，又是一个强调可控制性的时代，因而对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东西奇特地显示出一种非科学的态度。”

于是，“乙肝歧视”“艾滋歧视”“SARS恐慌”等仍然广泛存在于今天的社会，对于“他者”的排斥和压制与日俱增，在正确的隔离和防护之外，常常还有排外、敌对和歧视发生。

关于艾滋病的隐喻从未远去，这种疾病背负着犯罪感和羞耻感，代表着身体与道德的不洁，曾被视为来自非洲的侵扰，或者被看作美国的细菌战，关于艾滋病的隐喻深入文化、社会、种族、政治和军事。

事实上，正是艾滋病的出现让人意识到，流行性疾病远没有被人征服，未知的灾难性流行病仍会再度袭来。科学性地面面对包括传染性流行病在内的疾病，在医学上建立更完整的疾病叙事，真正消除疾病的负面隐喻，才能将疾病还原到生理和医学本身，让患者远离社会和文化系统中的附加伤害。

反对疾病的隐喻，正如桑塔格所言，因为身体不是战场，患者既不是在劫难逃的牺牲品，也不是敌人。我们——医学和社会——并没有被授予什么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击，包括那些裹挟在隐喻里的攻击。

战疫史志



“最单纯的女学生陷入热恋时，都有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句为她倾诉衷肠。可是让一个病人试着向医生描述他的头疼，语言立即就变得干巴巴的了。没有任何现成的词句供他使用，他被迫自己去创造新词，一手拿着疼痛，另一手拿着声音。”伍尔夫和其他文学家大概最早意识到，疾病不止是生理和医学范畴的事实。

在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中，19世纪的人文抒情被认为与实证医学出自同源，死亡被上升到一种哲学高度，疾病也被赋予了情感意义。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延续她“反对阐释”的观点，进一步考察了传染性流行病（尤其是肺结核、麻风病、艾滋病）以及癌症是如何隐喻化——从一种客观的身体疾病转换为一种道德批判或政治态度。

“疾病隐喻”这一概念随之成为了人文医学和文化研究的热点。回顾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流行病，鼠疫曾被视为上天降罪的工具，肺结核是优雅的浪漫病，霍乱则是对堕落者的诅咒……疾病绝非只是医学范围的事实问题。

桑塔格提到的一些瘟疫隐喻，如今已经因为医学的发展逐渐消失，但随着传染性流行病再次出现，关于疾病的隐喻仍未消弭，如今从“乙肝歧视”“艾滋歧视”到“SARS恐慌”，新的隐喻仍然在修辞学层面影响着美学、道德、政治和种族。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